

精英、政党与制度：吉尔吉斯斯坦 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逻辑^{*}

王林兵 雷 琳

【内容提要】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围绕着国家权力的建构，依照不同的政治逻辑，先后经历了精英转换与权力重塑、威权盛行与政党崛起、制度重建与议会民主三个政治发展阶段。由于国家权力建构进程尚未完结，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在精英、政党与制度三维因素的影响下，仍然面临着精英的民主预期与制度的民主能力不匹配、权力利益的内卷化与民主利益的社会化相悖、精英力量的非对称性与制度的对称性矛盾等困境。在制度重建过程中，优先建立起政府权威，以机构权威代替个人权威促进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而建立起以议会为核心的中央权威，乃是吉尔吉斯斯坦现阶段制度重建与民主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吉尔吉斯斯坦 政治发展 政党政治 政治精英 制度重建

【作者简介】 王林兵，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雷琳，中国国家博物馆培训部教授，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2018年8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表示“正在制定2040年前的国家发展战略，旨在使吉尔吉斯斯坦成为发达和真正独立的国家”^①，这是吉尔吉斯斯坦继2010年提出“建成自由民主的议会制国家”之后，为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设定的新的长远发展目标。议会制时代以来的吉尔吉斯斯坦，何以实现政治局势的稳定且能在政治共识中不断制定出内在持续的发展目标；同时，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为何在民主政治的建构尚未完结的情况下，快

^{*}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招标课题“议会制政体下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研究”（XJEDU040316C03）、新疆地方公派出国留学成组配套项目“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研究”（XJDF201321）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吉尔吉斯斯坦将制定2040年国家发展战略》，<http://news.cri.cn/20180813/129127a2-5950-d933-7a9b-feeb4d20e5d8.html>

速走向民主崩溃，其背后的政治发展逻辑都值得我们探究。本文试图从政治精英、政党和政治制度切入，把握吉尔吉斯斯坦不同时期政治发展的逻辑，以期更好地理解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进程和走向。

一 核心概念与研究假设

何谓政治发展？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研究的不同流派，对政治发展有不同的认知。阿尔蒙德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出发，认为政治发展是指在一定的政治体系中，文化世俗化和政治结构分化的过程^①；卡特莱特从社会过程出发，认为政治发展与沟通体系、教育体系、经济制度、都市化程度和劳动力分配等有着密切的互赖关系^②；派伊以比较历史法为分析工具，认为政治发展是指在工业社会中，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多元社会变迁过程的一个方面，尤其是指行政和法律、大众动员与参与、民主制度、政治动员和权力等方面稳定而有序变迁的政治现代化过程^③。由此可见，政治发展是一个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维度的广泛概念。在中国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政治发展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广义上，它是指政治体系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狭义上，它则是指政治体系内部在结构、功能和制度上的合理化、科学化。”^④并且，从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与实践来看，“政治发展的主题经历了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国家治理能力的演变”^⑤。综合以上分析，同时为突出研究主题，本文主要借鉴上述比较历史法的定义，并吸纳国内学者理论观点，将“政治发展”界定为，在一国之内，各种政治力量以国家权力为核心，通过斗争与合作促使政治体系内部变革，进而推动政治制度完善、社会参与扩大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其中，政治精英、政治组织（主要指政党）、政治制度是影响政治发展的最核心的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发展并不等于政治进步”^⑥，还包括一定历史条件下发

① [美]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 2007 年。

② Phillips Cutright,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8, 1963 (02): pp. 253–264.

③ [美] 鲁恂·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49～61 页。

④ 孙关宏：《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版，第 317～318 页。

⑤ 张勇：《政治发展的主题与逻辑：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国家治理能力建构》，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 年第 9 期。

⑥ 薛福岐：《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两度政变与政治发展前景》，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

生的政治衰败，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政治衰败在很多方面也是政治发展的条件。所谓政治衰败，是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缺乏制度化的政治体制无法吸纳新的政治要求，无序的社会参与导致政治失序^①，以及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失衡而引起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②的政治现象。因此，政治发展是一个曲折发展的总体进程。在这一总体进程中，无论是社会因素、经济因素，还是外部因素，要作用于一国的政治发展，也只能在政治精英、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结成的一定政治关系中发挥作用。因此，在实行西方民主制的新兴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政治精英、政党组织和政治制度是影响政治发展这一因变量的三个核心自变量。任何一方政治取向的变化，都会塑造出不同的政治发展态势（见表1）。

表1 政治精英、政党、政治制度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发展态势

	政治精英	政党	政治制度	政治发展态势
模式1	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威权传统持续处于主导
模式2	要求民主化	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政治民主化开启
模式3	谋求威权统治	要求民主化	维持现状	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政治民主化可能衰退，也可能缓慢发展
模式4	谋求威权统治	要求民主化	要求民主化	
模式5	要求民主化	要求民主化	要求民主化	政治民主化可能积极推进

在民主政治建构的进程中，政治精英（指执政精英）主要有维持现状、谋求威权统治、要求民主化三种政治取向；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载体，其政治取向主要有维持现状和要求民主化两种；而作为预先性地指向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在运作中也有维持现状和要求民主化两种政治取向。通常，在民主政治建构的早期阶段，政治精英、政党和政治制度都要求维持现状（模式1）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且任何一方政治取向的改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威权政治传统持续处于主导地位的局面。根据一般经验，在民主政治建构的早期阶段，虽然政党内在地要求实行民主制，且政治制度预先性地指向民主政治，但由于政党力量弱小、政治体制不健全，政治民主化的全面开启，往往依赖于处于权力中心的政治精英率先付诸民主化实践（模式2）。然而，受威权政治传统和政治民主化改造阻力的影响，执政的政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②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治精英并不总是能够坚定地秉承政治民主化取向。当政治精英谋求威权统治时，作为民主政治核心载体的政党往往会放弃维持现状的政治取向而要求政治民主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政治制度表现出何种政治取向，都难以规制激烈的政治斗争（模式 3 和模式 4）。当威权势力强于民主势力时，政治民主化则可能出现衰退，反之，则可能缓慢地进步。当政治精英、政党和政治制度都要求深入推进民主化时，则可能规避激烈的政治冲突，但政治发展能否呈现出稳定、有序的民主化态势，则取决于政治制度能否有效规制各方政治势力间的政治博弈（模式 5）。在上述五种政治发展模式，虽然政治精英、政党和政治制度并不彼此孤立地发挥作用，事实上也不可能独立地作用于政治发展，但三者在政治发展不同时期的政治取向和政治作用却不尽相同。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那些经历了“威权制度瓦解——民主制度建构——民主政治崩溃——民主制度重建”历史进程，且致力于向西方民主制度转型的新兴独立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发展的一般逻辑。

逻辑一 在威权制度瓦解后的民主政治建构期，政治精英往往将自我身份的转换与国家权力的重塑同步推进，处于权力中心的政治精英是启动政治民主化的关键，在实践中往往秉承着“以执政精英的权威推动国家民主化改造”的逻辑。这一逻辑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是因为民主政体和政党制度虽然在形式上建立了起来，但仍缺乏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有效能力，而处于国家权力中心的政治精英，在规划政治发展路径、设计国家政治制度、设定政治发展目标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逻辑二 在民主政治崩溃期，中央集权的强度打破了“民主—集权”的平衡，民主势力通过政党组织起来，并秉承“以政党竞争对抗威权统治”逻辑展开合法的政治斗争。当合法的政治斗争无力恢复政治民主时，则可能诉诸于政治革命。

逻辑三 在民主政治重建期，政治精英之间、政党之间开始有意识地在政治共识中谋求政治民主化，其核心逻辑是“以新的民主制度平衡各方势力、规制政治博弈，避免民主政治的再度崩溃”。

事实上，世界上那些具有威权政治传统又致力于向西方民主制度转型的新兴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大都经历了（有的正处于）从模式 2 到模式 5 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其政治发展的主导思维也契合于上述三种逻辑，吉尔吉斯斯坦也概莫能外。因此，要准确认知吉政治发展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趋势，就必须以整体性视野来考察和研究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进程。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大都从政治发展的子范畴——“政治转型”，展开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的研究。所谓“政治转型”，普遍认同的定义是，“政治转型指的是由一种政治

形态转变为另一种政治形态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根本性的制度变迁”^①。在具体研究中，国外学者一般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从比较研究视角出发，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不同，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大国干涉是阻碍其政治转型的关键因素^②；其二，从政治冲突视角出发，认为在部族认同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政治转型失败的根源在于缺乏稳固的国家政治认同，进而导致国家缺乏管理冲突与危机的能力^③；其三，从政治文化视角出发，认为“暴力对抗”的政治文化是“街头政治”频发的文化动因，也是诱使吉政权两度更迭的深层次因素^④；其四，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型受到民族主义的“诅咒”，并与南北问题、大国博弈等相互交织，塑造出吉尔吉斯斯坦“脆弱”的国家形象^⑤。而国内学者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研究也相当丰富，概括起来，主要从民主选举、政党政治、经济发展、制度建构、政治腐败、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政治文化、部族主义、大国博弈等方面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虽然很好地解释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进程出现“政治衰败”的诸多原因，但其对吉尔吉斯斯坦当前取得的“政治进步”却缺乏充分的解释力。与此同时，过多地将研究聚焦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中的“政治衰败”，也无法揭示出其政治发展的逻辑，会进一步导致无法科学研判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趋势。鉴于此，为了更好地把握和理解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本文立足于吉尔吉斯斯坦不同时期的政治发展状况来加以研究。

二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不同时期政治发展的主导逻辑

（一）精英转换与权力重塑：以总统集权促进国家改造

1991年至2002年，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国家民

① 封帅：《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的概念与范式辨析》，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Eder, F. and Halbach, U. “Regime change in Kyrgyzstan and the specter of coups in the CIS”, *SWP Comments*, 2005/C 16, April 2005.

③ Wolters A. *Group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Kyrgyzstan: A Theoretical Approach*.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2007.

④ Kevin D. Jones, *A Culture of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Overthrow in the Kyrgyz Republic in 2010*,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 at Maryland, 2011.

⑤ Anna Matveeva. *Kyrgyzstan in Crisis: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the Curse of Nationalism*. Crisis States Research Centre (CSRC), 2010.

主权力的建构阶段。在这一阶段，精英转换与权力重塑同步进行。精英转换是伴随着政治变迁必然发生的政治现象。制度变迁中的精英转换，往往是主导政治进程的各方势力在政治博弈中相互妥协和重新分割权力的结果。影响精英转换的因素众多，包括政体更迭、阶级变动、经济变迁、政治传统、社会分化等等。20 世纪 90 年代吉尔吉斯斯坦的精英转换，主要是以国家独立为根本诱因，以民主选举为平台，以组建政党为途径，以制度惯性为路径依赖来实现的。“采纳民主规则始终是政治精英们有意识的选择。”^① 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精英群体开始从威权体制的捍卫者向民主政体的推崇者转变。自主运行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开放、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以使政治参与者在新的权力架构中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力，这也直接关系到民主价值的确认、推广和巩固。

宏观上看，这一阶段的政治发展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991 年国家独立到 1993 年，是以总统制下的分权民主促进国家改造的时期。独立伊始，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三权分立、私有制、法制等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原则迅速被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祭起，用以建构民主的国家权力。1993 年 5 月，吉尔吉斯斯坦颁布了独立后的首部宪法，总统制下的三权分立体制确立起来。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吉尔吉斯斯坦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掀起了全面自由化的风潮，并开始以“中亚民主岛”的主权国家形象参与世界事务。

第二个时期，从 1994 年到 2002 年，是以总统集权推动国家改造进程的时期。在威权体制向民主政体过渡的进程中，分权释放出的强劲政治动员力，使各方政治势力对三权分立都有着极强的利益动机，试图利用所接触和占有的权力，最大化地实现利益诉求并达到自主。这种态势在客观上导致分权体制下政治运作混乱、政治改革无力、体制与权力之间失衡。为遏制这种局面的恶化，时任总统阿卡耶夫诉诸修宪，重新调整中央权力分配，开始推行以总统为主导的政治民主化改造方案。阿卡耶夫指出，现有体制“实际上使总统处于英国女王那样有名无实的地位，无法保证有效、充分地发挥保障公民权力和自由、协调各权力机关等宪法所赋予的各项职能”^②。这实际上反映出阿卡耶夫“只有建立以总统为中心的集权制度，才能保证民主政治的实现”的政治思维。这一时期，受俄罗斯和中

^① Rustow DA.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1970, pp. 337 - 363.

^② 《阿卡耶夫的电视讲话》，载〔吉〕《言论报》1996 年 1 月 14 日，转引自晓君：《转轨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载《东欧中亚研究》1997 年第 3 期。

亚邻国由“弱总统”向“强总统”变革效应的外溢影响，阿卡耶夫开启了以总统集权推动国家民主化改造的进程。在1994~2002年间，阿卡耶夫积极扩权，削弱议会，增强对政治发展的塑造力，以此推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在阿卡耶夫看来，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虽同时推进，但都后劲不足，发展缓慢，“只有强有力的政权才能确立民主制度和市场机制，并使之正常运转”^①。通过1994年、1996年和1998年三度修宪，阿卡耶夫逐步建立起了以总统为核心的集权政治体制。在权力格局上，阿卡耶夫实际建立起四维权力体系，即总统、议会、政府、司法。在权力设置上，总统不仅干预议会的能力得到增强，行政职权也得以扩充。虽然这一时期阿卡耶夫执政方式带有独裁的色彩，但其基本思维仍然是以总统集权推动国家改造，并且这在当时也显得十分必要。因为1991~1993年的“小私有化”顺利完成后，1994~1998年的“货币私有化”进程基本停滞不前，仅靠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力量，不足以推动“货币私有化”目标的实现。

然而，多次强行修宪，直接导致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尖锐对立。2002年3月，贾拉拉巴德州六名支持反对派的民众遭警察射杀，引发全国性抗议。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反对派政党动员的全国性抗议中，阿卡耶夫集权统治的合法性备受动摇。面对反对派政党高强度的政治挑战，阿卡耶夫将政治重心从推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转移到维护个人权力上来，“以总统集权促进国家改造”的思维逐渐被“以总统集权维护个人权力和家族利益”的思维所取代。

（二）威权盛行与政党崛起：以政党竞争对抗威权政治

2003年至2010年“二次革命”结束，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从整体上看，吉尔吉斯斯坦处于民主政治的崩溃期。在此期间，政治领域权力寻租、权力垄断常态化，总统权力急剧膨胀，总统个人权威成为谋求重建威权政治的工具。而追求与维护民主价值的政治精英，则以政党为工具、议会为平台，辅以街头革命，与总统展开了各有攻守进退的博弈。在经历2005年“郁金香革命”和2010年“二次革命”的洗礼后，吉尔吉斯斯坦政党在动荡与混乱的政局中发展壮大。

这一阶段，大致也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03年到2005年“郁金香革命”结束。阿卡耶夫在其执政后期，为应对反对派频仍的政治挑战，不断强化总统集权，逐渐偏离了以总统集权推进民主化改造的路线，迈向“复辟”

^① 《阿卡耶夫的电视讲话》，载〔吉〕《言论报》1996年1月14日，转引自晓君：《转轨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载《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3期。第33页。

威权政治的道路。在经济上，阿卡耶夫家族掌控着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的关键领域。如阿卡耶夫大女婿阿利季·托伊贡巴耶夫几乎掌握着吉尔吉斯斯坦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阿卡耶夫的儿子艾达尔则掌握着超市、夜总会和电信公司等企业^①。在政治上，2003 年 2 月，阿卡耶夫通过全民公投的形式颁布了新宪法，把两院制议会改为一院制；将议席数量由 105 个减至 75 个；取消政党比例代表制，实行单一选区制，以此来削弱和限制议会中反对派政党的力量。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反对派的政治挑战，阿卡耶夫还支持其女儿贝尔梅特·阿卡耶娃于 2003 年组建了“前进，吉尔吉斯斯坦！”党，该党实际上由阿卡耶夫领导，政治实力远胜于反对派政党。为了在 2005 年议会选举中与“前进，吉尔吉斯斯坦！”党对抗，反对派政党相互结盟，组建了吉尔吉斯人民运动、公平公正选举联盟、“新道路联盟”和“祖国联盟”等四大政党联盟，这些联盟与吉尔吉斯共产党人党和“尊严”党共同合作构成反对派阵营的主要力量。尽管如此，在 2005 年议会选举中，亲总统政党依然获得了 69 个议席，而反对派政党仅获得 6 个议席^②。2005 年 3 月，反对派政党以“民主、反腐、实行议会制”等为口号进行抗议动员，向阿卡耶夫政权施压。最终，反对派政党领导的抗议活动，在外部势力渗透参与下演变成暴力的“郁金香革命”，阿卡耶夫政权随之被推翻。

第二个时期，从 2005 年“郁金香革命”结束到 2010 年“二次革命”落幕。“郁金香革命”后，2005 年 7 月举行总统选举，代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赢得大选。然而，巴基耶夫主政后，不仅丝毫没有兑现反阿卡耶夫时的民主承诺，反而任人唯亲，政治更加腐败。巴基耶夫执政期间，其兄弟扎内士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主任，并实际地监督着所有执法机构；另一个兄弟马拉特被任命为驻德国大使；第三个兄弟阿克马特则实际控制着贾拉拉巴德州的地方政府；巴基耶夫的大儿子马拉特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小儿子马克西姆则担任着国家发展、投资与革新部部长，实际掌控着国家的经济领域^③。巴基耶夫家族式执政方式，令要求限制总统权力、实行议会制的政治精英们极为失望，导致其众多追随者投身反对派。2005 年 8 月至 11 月，短短三个多月内，时任最高检察院检察别克纳扎罗

① Azamat Temirkulov.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0, 38 (5): pp. 589 – 600.

② Выборы депутатов,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Цифры и факты. Б., 2005. С. 438 – 441.

③ Azamat Temirkulov.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0, 38 (5): pp. 589 – 600.

夫、外交部长奥通巴耶娃、议会议长捷克巴耶夫、贸易部长阿塔姆巴耶夫等纷纷投身于反巴基耶夫的阵营中^①。为了巩固威权统治，巴基耶夫支持组建了“光明大道”党，并实际领导着该党，与其他反对派政党争夺议会席位。

在2007年1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光明大道”党独占议会90个议席中的71个，反对派政党仅获得19个席位^②。2007年议会选举之后，反对派政党中的温和派，积极与巴基耶夫执政当局展开谈判，而激进派则鼓动社会民众进行游行抗议。反对派政党在温和谈判和激进抗议中不断壮大，为了化解反对派带来的政治风险，巴基耶夫在2009年强行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并以76.12%的得票率，力压反对派政党提名的候选人阿塔姆巴耶夫^③。

在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连续败北的反对派政党，与巴基耶夫执政当局之间的矛盾日益不可调和。2010年年初，陷于金融危机中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巴基耶夫政府开始提高能源、供暖和移动通信等公共服务费，以缓解财政窘境。仅2010年2月，城市居民取暖成本就增加了400%，电力消费成本增加了170%。2010年3月，反对派政党组织召开地方集会，提出削减公共服务费、恢复被私有化的通信系统、归还人民权利等要求，但由于缺乏独立媒体，反对派政党并未能有效动员起社会民众^④。2010年4月6日，反对派政党“阿塔·梅肯”党副主席舍尔尼亚佐夫在塔拉斯地区被捕，激起了当地反对派支持者的不满，他们攻占了塔拉斯州政府。此事件在网络上一经传开，比什凯克市的不满民众迅速行动起来，集聚街头要求巴基耶夫下台。在反对派政治精英的领导下，短短两天便夺取了政权。获得政权的民主派政治精英们，开始重建政治体制，以削弱总统权力、提高议会地位、发展政党政治等为途径建构议会制政体。

总体来看，尽管反对派政党在2003年至2010年间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备受挫折，但始终是反对派政治精英用来对抗总统集权统治的政治工具。与此同时，对执政的政治精英而言，政党也是用以维护集权统治的工具。因此，反对派政治精英与执政当局之间的权力对抗，便演化成了政党间的选举竞争和政治博

① Kevin Koehler,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 Building: Electoral Politics and Ruling Party Forma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Kyrgyzstan”, *OSCE Academy in Bishkek* (2009), pp. 16-19.

② Базарбаев К., Жумагулов Б.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Фридриха Эберта, 2012. С. 93-97.

③ АКИпресс. ЦИК обработал данные со всех участков, за К. Бакиева проголосовало 76.12%. 2009-7-27, <http://kg.akipress.org/news/106381/>

④ Azamat Temirkulov.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0, 38 (5): pp. 589-600.

弈。概而论之，在这一时期，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在反总统专制独裁的政治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成为对抗威权政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力量。

（三）制度重建与议会民主：以议会制政体规制政治博弈

巴基耶夫政权垮台后，奥通巴耶娃领导的临时政府于 2010 年 6 月 27 日颁布了新的宪法（简称“2010 年宪法”），确立了议会制政体，标志着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由总统集权制时代进入了议会制时代。议会制政体下的政治发展与总统集权制下的政治发展最大的区别，在于议会取代总统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议会对行政权的影响力获得实质性的提高。因此，2010 年议会制政体确立至今，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政治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是以重建政治制度、发展议会民主、巩固社会秩序，进而规制政治博弈的逻辑展开。

在制度重建上，2010 年宪法构建起了三权分立的议会制政体，重新分割了总统、议会、政府的权力。2010 年宪法规定，议会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拥有立法权、组阁权、监督权、财政权等。而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象征着人民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吉尔吉斯斯坦在对内对外事务中的代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仲裁作用。议会多数派政党或党团依法组阁，是政府产生的唯一方式。政府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并接受议会的质询和监督。2010 年宪法明确了政府的身份隶属和领导体制，使政府不再受总统权力的钳制，既保证了上下畅通、权责分明，又极大地扩展了政府的自主性和适应性。2010 年宪法通过重置总统与议会的权力和地位，回归议会与政府的身份和责任，构建起不同以往的民主制度，有效地规制了总统与议会间权力博弈，促进了政治局势的平稳发展。

尽管 2010 年宪法构建起了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但在总统、政府、政党等方面仍有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在总统权力上，2010 年宪法赋予了总统任免中央和地方法官、检察官、国防安全部门要员，任免中央选举委员会、审计署部分成员，以及提名国家银行主席候选人和任免国家银行副主席及其他银行要员的权力^①。政府虽不对总统负责，但总统仍保留有一定的权力，干预政府、司法机关的人事任命；在政党政治上，2010 年宪法规定“议会多数派政党或政党联盟，应在新一届最高议会一次会议召开后 15 个工作日内，选举产生政府总理，并由总理完成组阁。”^② 较短的组阁时限对缺乏成熟执政经验诸政党而言，

^① Конституция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2010), Статья 64.

^② Там же, С. 84.

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往往导致议会对其组建的政府内阁投不信任票。此外，2010年宪法规定，议会由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过半议席的政党执掌，在所有议会党团均未获得过半议席的情况下，则由多个议会党组建的执政联盟执掌。这一规定明确了政党进入议会执政联盟的原则和条件，但并未对政党退出执政联盟的原则和条件加以规定，因此导致议会执政联盟在后续的运作中频繁解体和重组。凡此等等，都暴露出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宪法框架下的政治体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为了进一步完善政治体制，推动民主进程，吉尔吉斯斯坦于2016年12月以79.58%的支持率通过了新宪法^①，开启了全面向议会制过渡的进程。

在推进政治运作向议会制全面过渡方面，吉尔吉斯斯坦通过宪法改革进一步调整了中央权力。在总统与政府方面，2016年宪法赋予了总理或代总理代行总统职务的权力，如第68条规定：“当总统依宪提前结束任期时，由最高议会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若议长不能代行总统职权，则由总理或代总理行使总统职权”。与此同时，2016年宪法还构建了一个更为强势的政府，如第86条规定“总理每年有不超过2次要求议会对政府投信任票的权力”，而2010年宪法仅赋予总理不超过1次要求议会对政府投信任票的权力，如此，扩大了总理强行要求议会支持政府政策、法案的权力。在总统与议会方面，总统的人事任免权受到更大的限制，而议会在人事任免上有了更大的决定权。如2016年宪法第64条第4款规定：“总统有权在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任命检察长；在法定的情况下，总统在议会至少一半议员的支持下可解除检察长的职务。”而在2010年宪法中，总统解除检察长的职务只需议会三分之一的议员投赞成票即可。在政党方面，议会选举后执政联盟组建内阁的时限得以延长，这有利于政党通过充分的谈判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执政联盟。如2016年宪法第84条规定，议会选举后执政联盟选举产生总理的期限为25个工作日，而在2010年宪法中这一期限为15个工作日。同时，2016年宪法明确了政党退出执政联盟的机制。第70条第3款新增内容规定：“议会多数派党团的政党退出执政联盟，需由党内不少于三分之二的成员赞成。”政党退出执政联盟的机制的明确，从法理上抑制了政党退出执政联盟的随意性，增强了执政联盟的稳定性。此外，在促进民主政治上，吉尔吉斯斯坦不断提高总统选举、议会选举的公开、透明、公正性，以此消除选举过程中政党之间的隔阂，培养政党间的政治信任。

在重构国家政治体制的同时，吉尔吉斯斯坦还不断推进选举制度的变革，以

^①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избиратели поддержали новую Конституцию. <http://24.kg/obschestvo/41410/>

更加透明、公平、民主的选举制度规制选举进程中的政治博弈。在 2010 年的议会选举中,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相较于 2007 年议会选举作了诸多调整。如在 2010 年议会选举中,政党进入议会需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不少于 5% 的选票”;“在比什凯克市、奥什市以及其他各州获得不少于 0.5% 的选票”。而这一选票门槛,在 2007 年议会选举中为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不少于 5% 的选票和在比什凯克、奥什市以及各州获得不少于 13 500 张选票^①。2010 年议会选举将双线门槛的“比例化”,有利于强化政党的代表性,提高选举的竞争性和公平性,也有助于挽回过去总统过度集权导致中央政权合法性日渐式微的局面。在 2010 年议会选举中,进入议会的政党过多,直接导致议会执政联盟内部过于松散,制约着议会的运作。2011 年,吉尔吉斯斯坦颁布了议会制时代的第一部选举法,即《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与议会选举法》(简称“2011 年选举法”)。在制度设计上,该法案明确规定,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为在全国的得票率不低于 7%;在比什凯克市、奥什市以及各州的得票率不低于 0.7%^②。较高的门槛限制,目的在于降低议会内部的碎片化程度,提高议会执政联盟的稳定性。2015 年议会选举前夕,吉尔吉斯斯坦重新修订了选举法,在保留 2011 年选举法设定的议会选举门槛的同时,引进了生物指纹识别技术,重新调整了选举管理机构,以此提高选举进程的透明度,杜绝选举中发生的违规、违法行为。新修订的选举法案还对政党的竞选资金做了更加严苛的规定。2015 年新修订的选举法明确规定,参与议会选举的政党至少提交 500 万索姆用作竞选基金^③,而这一额度在 2011 年选举法中仅为 100 万。这既增强了议会选举的竞争性,也提高了议会制下民主选举的质量。

在重建政治制度和变革选举制度的同时,吉尔吉斯斯坦还通过提高人民权利、增加人民收入、严厉惩治腐败来恢复人民信任、修复族际关系,以此培育议会制政体稳定的社会基础。如在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实施了《2013~2017 年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框架下,各行业的平均工资均实现了增长,如教师行业国内工资激励部分平均增加 12.1%,学前教育机构教师的工资提高 80%,达到平均 13 824 索姆^④。在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工资的同

① Kyrgyz parliamentary election 2007.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Kyrgyz_parliamentary_election, 2007

② "О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депутатов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2011), Статья 64.

③ Там же, С. 62.

④ 《吉尔吉斯斯坦教师的平均工资约为 200 美元》, http://www.sohu.com/a/129101902_636359

时，吉尔吉斯斯坦还开展了强力的反腐行动，如在司法领域建立了法官理事会的纪律监察委员会，配合司法部预防腐败委员会进行廉政建设。在反腐重拳之下，2017年4月，第一副总理阿利姆巴耶维奇和总检察长焦尔杜巴耶娃等涉腐官员被解职。

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吉尔吉斯斯坦不遗余力地推进族际关系和解，加强对民族事务工作的管理。在政治建构中，吉尔吉斯斯坦成立了专门负责民族宗教事务的政府部门。2011年成立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公民社会协作处”是总统制定民族宗教政策的咨政机构，负责向总统汇报民族宗教情况，旨在制定改善民族关系的国家政策，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2013年成立的“地方自治与民族关系事务局”隶属于政府，负责建立民族冲突的早期预警和应急体系、改善族际关系、提高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保护民族多样性和民族文化遗产等等^①。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吉尔吉斯斯坦将促进民族和解、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等作为重要内容确定下来。如《2013~2017年吉尔吉斯共和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促进民族团结工作的三大方向，即增强人民内部团结，以公民意识培育爱国主义，以增进族际关系和谐；理顺国家与宗教以及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加强国家对宗教事务工作的管理；贯彻言论自由政策，制定国家信息政策，保障人民对国家政府的知情权、批评权和监督权^②。而《2018~2022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发展战略》围绕着“团结、信任、创造”等主题，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展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支持和发展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加强共和国公民身份认同，以增强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友好关系。在相关工作的优先事项中，强调加快发展不同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为各民族青年的发展提供政策和资源支持。与此同时，扩大吉尔吉斯人民大会的作用，以促进族际和谐和构建共同的社会价值等^③。《2018~2040年吉尔吉斯共和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草案）在前述两大发展战略基础上，围绕着“发展人的潜力”，提出了提高经济福祉、增进社会福祉、创造安全环境、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四大目标，明确提出要制定加强人民团结和族际友好关系的民族政策、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制定宽容多元的文化政策、公平

①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http://www.ca-portal.ru/article/11028>

②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а период 2013 - 2017 годы. <http://caa.kg/aviaciya-ustoichivoe-razvitie/strategy-nsur-kr-na-2013-2017/>

③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а период 2018 - 2022 гг. https://www.multitrans.ru/c/M10.exe?t=7680248_2_1

分配社会公共服务资源、防范执政执法过程中的民族歧视、保障和实施公平公正的人事政策，等等^①。致力于促进族际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自 2010 年议会制政体确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主要以建立全面的议会制为目标，以议会制规制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博弈，以更加民主、透明、公平的选举制度约束选举进程中的政治抗争，以恢复人民信任和修复族际关系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等来进行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展开实践的。

三 精英、政党与制度：三维之下的政治发展困境

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的上述三个阶段中，各有一个核心推动力，分别是政治精英、政党和政治制度。诚然，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政治精英、政党与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泾渭分明地独立运作，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三者的政治取向和政治作用各不相同。就吉尔吉斯斯坦而言，在其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中，政治精英群体发挥着关键作用。政治精英对制度的选择和国家转型目标的设定，为政治发展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和依赖。在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中，政党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下，反对派要在体制内外对执政当局有效施加压力，必须展开组织化的政治抗争，而政党便成了这种政治抗争的核心工具。在政治发展的第三阶段，议会制则成了政治焦点。威权制度崩溃后，亟待确立起新的民主制度以规制政治博弈，议会制作为一种尚未尝试过的政体，便被赋予了新的使命。虽然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局势几经动荡后日趋平稳，但交织于政治精英、政党与政治制度三维因素之中的政治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将会直接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一）精英的民主预期与制度的民主能力不匹配

自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日起，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世俗的宪政国家便是其既定的政治目标。为打造“中亚民主岛”，吉尔吉斯斯坦引进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政治多元化，改革选举制度，实行多党制。从经典的民主政体设计来看，议会制和总统制各有利弊，吉尔吉斯斯坦吸纳了两种政体的主要设计理

^① Проект стратеги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а 2018 – 2040 гг. <http://ru.mes.kg/2018/02/22/proekt-strategiya-ustojchivogo-razvitiya-kyrgyzskoj-respubliki-na-2018-2040-gg/>

念，构建起总统制与议会制相交融但又异于法国“半总统半议会制”的混合政体。看似集两种政体之所长的混合政体，却未能带来预期的民主成效，反而致使国家政权内部形成了二元权力中心，即总统和议会。在二元权力中心的政治体制下，政权合法性也呈现为二元结构形态，即本国传统政治价值与外来的西式民主政治价值并存的二元格局。在政治实践中，政权合法性的二元结构极可能导致政治理念与政治过程脱节甚至相背离。在吉尔吉斯斯坦，二元的权力中心和二元的政权合法性在国家政权内部形成了对立的二元制度，即分权体制与集权体制的对立。在体制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矛盾中，权力与体制的互动呈现两大图景：一是集权体制对分权体制的扩展性形成内部约束和限制。总统集权在约束泛化无序民主的同时，也导致了总统权力膨胀，分权过度弱化，威权政治与家族政治盛行，民主价值被无视；二是三权分立体制难以控制分权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以致权力格局外显为“强总统一小政府一弱议会”。也正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长期陷于二元权力中心造成的政治博弈、对抗的涡流之中，铸就了吉尔吉斯斯坦集总统制与议会制的脆弱性于一身的政治体制。混合体制内集权与分权的结构性对立，既没有发挥出集权的力量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民主的价值优势。

“二次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试图消除总统制的影响，建立了一个纯粹的议会制政体。然而，议会制发展民主的能力与政治精英的民主预期仍不匹配。所谓制度的民主能力，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扩展民主价值、维系政治秩序、实现治理目标、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力量。制度的民主能力越强，三权分立的制衡水平就越高，权力腐败就越能得到较好的抑制；选举政治也更加透明，社会内部也更充满活力；同时，国家治理水平也更高，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的政治诉求也能得到较好的实现和满足。反之，三权分立失衡，权力腐败无法抑制；选举政治有失公正，社会内部弥漫政治颓丧；政治精英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民众的普遍诉求得不到满足。由表2可见，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政治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议会制的民主能力不足。2010年至2012年，民主政治平稳向好发展；但2013年至2017年，民主政治的发展开始出现波动态势，全国及地方民主治理的发展近乎处于停滞状态。宏观上看，在三权分立的制度建设上，立法机构（选举进程）的发展明显快于行政和司法机构，政府的行政效能、司法机构的法律监督能力均未能达到合理的水平。若不加快政府和司法改革，纯粹的议会制政体仍旧难以将政治精英的民主诉求转化为政治现实。

表 2 2010 ~ 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民主政治发展评分^①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全国民主治理	6.75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选举进程	6.25	6.00	5.50	5.50	5.50	5.50	5.25	5.50
市民社会	5.00	4.75	4.75	4.75	4.50	4.75	4.75	5.00
独立媒体	6.50	6.50	6.25	6.25	6.00	6.00	6.00	6.00
地方民主治理	6.50	6.50	6.50	6.25	6.25	6.25	6.25	6.25
司法独立	6.00	6.50	6.50	6.25	6.25	6.25	6.25	6.50
腐败	6.50	6.25	6.25	6.25	6.25	6.25	6.25	6.25
民主得分	6.21	6.11	6.00	5.96	5.89	5.93	5.89	6.00

（二）权力利益的内卷化与民主价值的社会化相悖

权力利益的内卷化，主要体现在随着权力带来的制度、经济、政治利益的增长，这些权力“红利”日益趋向于在权力支配者中间进行分配，以带来更大的机会和利益。而这与民主制度下发展成果与利益的大众化、社会化的制度诉求相悖。在吉尔吉斯斯坦宪政民主制下，政治权力是实现和维护精英群体及其家族利益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一部分政治精英的国家利益意识缺位，“在这个体制里使自己变得富有和使身边的环境变得更好乃是所有人的生活追求”^②。

政党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于集聚、调解、疏导和表达社会内部不同阶级、集团、族群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执掌政权，制定公共政策满足这些利益诉求，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充当着利益传导的政治介质。然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导致政党价值“迷失”，表现出“经济人行为”倾向，民主价值让位于经济价值，政党成为政治精英追求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和部族利益的工具。“在一国之内，发达的社会属性乃国家公职人员应首先具备的内在本质力量，如此，方能将实现和维护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政治价值选择的优先方向，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党，

① 该表为 7 分制，1 分代表民主政治发展的最理想化水平，7 分则代表最糟糕水平。Erica Marat. Kyrgyzstan country profile: Nations in transit ratings and averaged scores,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nations-transit/2017/kyrgyzstan>

② Anvar Bugazov, “Socio –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Society Formation in Kyrgyzstan”, *SILK ROAD PAPER*, August 2013, p. 78.

在追逐私利的政治精英的领导下日益丧失其公共价值。”^①“利用政治权势谋取经济利益，意味着政治的价值观和制度必须屈从于经济的价值观和制度，于是政治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②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败。由表3可见，议会制政体建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持续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政治腐败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总体仍属于政治“贪腐严重”的国家。据统计，“最富有阶层中80%是官员，其次才是商人”^③。在政权之内，家族和小团体利益取代人民的利益而成为政策目标，公共利益得不到实现，必然引发人民对政权的不满和离心。

表3 2010~2017年吉尔吉斯斯坦贪腐感知指数^④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CPI	2.0	2.9	2.4	2.4	2.7	2.8	2.8	2.9
参评国数	178	183	176	177	174	167	176	180
排名	164	164	154	150	136	123	136	135

（三）精英力量的非对称性与制度设计的对称性矛盾

所谓制度的对称性，是指一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势均力敌，轮流执政，不同政治势力的作用与地位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对称性。所谓非对称性，则指不同政治势力实力不等，也非轮流执政，而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与协作，不同政治势力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出某种非对称性状态。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之间因内外因素差异而实力不等，但政治精英在设计政治制度时却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各方政治势力实力对等。在此情况下，政治制度作为一种程序正义的框架，仅着眼于促进平等竞争，在实践中却忽略了结果正义，政治制度往往始终倾斜于力量强大的一方，进而导致弱势一方长期的政治颓丧，利益也无从得到实现。这种矛盾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选举政治和族群政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选举制度的设计原则中，各政党地位、权利、机会、适用规则平等，但在实际的选举进程中各个政党拥有的政治资源不等，这就导致有些政党可以利用“非正

① 王林兵、雷琳：《吉尔吉斯斯坦“低态化”政党政治形成的制度性因素分析》，载《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4期。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③ 赵龙庚：《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及新政权面临的挑战》，载《和平与发展》2005年第4期。
④ <https://www.transparency.org/>，CPI（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

式制度”的力量获得更多的机会。此外，总统虽然在任期间必须停止在政党中的一切活动，但其政治影响力仍在，这就导致组建议会执政联盟过程中，每个议会党并非具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实力强大的政党可能无缘于此，实力弱小的政党则可能长期盘踞执政联盟中。如 2010 年议会选举后，尽管“故乡”党是议会第一大党，但临时总统奥通巴耶娃却将组建议会执政党联盟的权力授予阿塔姆巴耶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三天后，由于社会民主党牵头组建的第一届执政联盟尚未运转就走向解体，奥通巴耶娃又迅速授权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共和国党，牵头组建了第二届执政联盟。政治精英之间不对称的实力，无形中挑战着议会民主制度的对称性制度设计。

制度的对称性与政治势力的不对称性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族群政治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制度设计上，多元的政治体制允许各民族精英参与国家政治，但实际上，国家各部门，即使地方上普通的政府岗位，也主要由吉尔吉斯族裔的政治精英把持，其他民族被排挤出政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圈，这导致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的政治颓丧。如 2015 年议会选举中当选的 120 名议员，仅有 2 名是乌兹别克族裔的政治精英，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着吉尔吉斯斯坦精英力量的不对称性，绝大多数政党的成员都由单一民族构成，即几乎所有的政党都由吉尔吉斯族政治精英构成，不存在乌兹别克族政治精英组建的政党，而大多数操俄罗斯语的斯拉夫人，更倾向于不参加任何政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政治参与和人事选拔中充斥着狭隘民族主义价值倾向，导致非吉尔吉斯族裔的政治精英在经济资源、社会地位和政治机会的竞争过程中，由于不具备赢得竞争的能力而处于弱势。在一定程度上，生活在南部地区的绝大多数乌兹别克族裔的政治精英是被动地卷入政治竞争当中的。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低下的社会地位，极易在乌兹别克族民众中形成整体弱势感，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失范的社会经济政策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阻碍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进程。

结 语

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有其特殊性，在由威权体制向议会民主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威权政治借助“民主”外衣频繁登上权力之巅，并与宪政民主政治相互交织，相互斗争。受此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几乎都围绕着国家权力的建构展开，不同在于建构国家权力的政治逻辑有所差别。民主政治建构期的政治发展逻辑，是“以总统集权推动国家改造”；民主政治崩

溃期的政治发展逻辑，是“以政党竞争对抗威权统治”；民主政治重建期的政治发展逻辑，则是“以议会制政体规制政治博弈”。不同的政治发展逻辑，塑造出吉尔吉斯斯坦不同时期中不同的政治图景。

通过从政治精英、政党与政治制度三个维度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的分析，我们也可得出以下几条结论：第一，政治精英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稳定的关键。政治发展路径的规划、政治制度的设计、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根本上取决于政治精英对国家民主化的预期。在政治运作中，当政治精英普遍践行民主价值、维护民主制度、尊重民主规则时，政治发展往往趋于稳定、有序；反之，则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失效和民主政治的崩溃。第二，主要政党间的互动模式是影响政治发展质量的重要变量。可以看到，在民主崩溃期，执政党派与反对政党派间对抗性的互动和博弈是诱发“街头政治”和“暴力革命”的重要因素。而在民主政治的重建期，诸政党在政治共识中积极寻求合作，则形塑了吉尔吉斯斯坦稳定、有序的政治发展态势。第三，议会制政体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决定着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的未来。尽管开放的议会制为各方力量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竞争空间，但要实现议会制政体的合法性的持续巩固，就必须增强议会制政体的有效性，根本上就是要提高议会制政体发展民主政治、规制政治博弈、维护社会稳定、培育社会民主基础、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

客观地看，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中固有的问题并未随着民主制度的重建而消失。精英的民主预期与制度的民主能力不匹配，权力利益的内卷化与民主利益的社会化相悖，精英力量的非对称性与制度设计的对称性矛盾等仍然横亘在其政治发展道路上，这也决定了吉尔吉斯斯坦不可能在短期内真正全面转向议会制。对吉尔吉斯斯坦而言，在国家权力的建构与社会秩序的修复进程尚未完结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都不强大，并且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并不紧密。在此情况下，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输出机构，其政策的有效性决定着社会对国家政权和议会制政体的认可度。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总统削权已是必然。然而，总统作为传统的政治核心的权威被削弱后，又面临着建构新的中央权威的政治问题。而议会作为新的权力中心仍处于变革之中，也难以在短时间树立起有效权威。在此情况下，集中力量提升政府有效政策的输出能力，优先建立政府权威，以机构力量代替个人力量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而树立起以议会为中心的中央政权的权威，乃是吉尔吉斯斯坦现阶段制度重建和发展民主、稳定有序推进政治发展的有效路径。

（责任编辑 陆齐华）